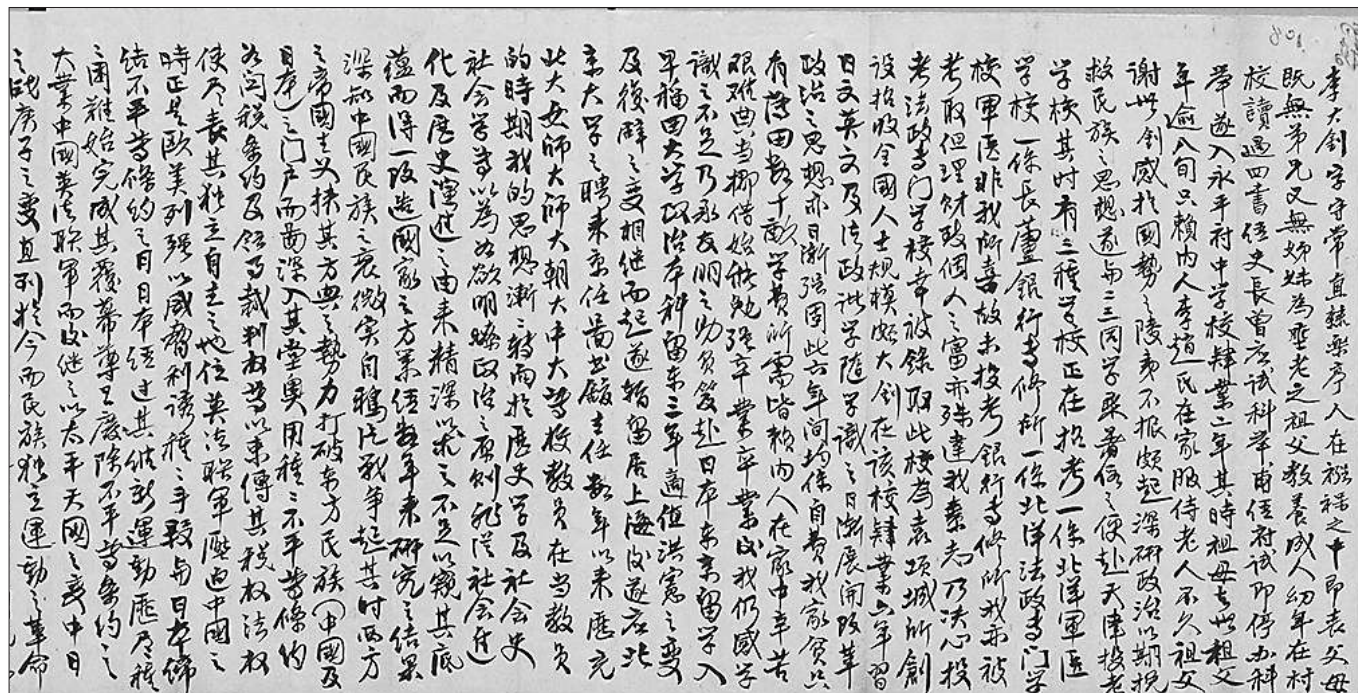


革命理想高于天

——李大钊《狱中自述》在国博展出

万婷



《狱中自述》第一稿(局部)

日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依托馆藏策划的“人格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展览正式对公众展出。

此次展览从家国情怀这一角度,精心遴选馆藏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饱含对家人、对国家热爱之情的遗书、手稿、家信等珍贵文献以及各类实物170余件,通过“革命理想高于天”“繁霜尽是心头血”“奉献如歌家国梦”“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四个单元,生动展现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不惧牺牲、不懈奋斗、不负人民的爱国情怀。

展览中,李大钊的《狱中自述》颇为令人动容。

篇幅。其中,他反复说明了深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而要“再造中国”,就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废除不平等条约。

对于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在第二稿、第三稿中都有论述,特别是第三稿进行了比较明确的论述:“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溃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因此,我乃决心加入中国国民党。”

实际上,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要求。第三部分,三稿都叙述了他加入国民党后从事的各种活动。不同之处在于,初稿就此事只写了寥寥数百字,而第三稿则用了大量的笔墨介绍他在国民党从事的各种工作。其原因何在呢?其一,李大钊被捕时的公开身份是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负责人。所以,在第二、三稿自述中,他用大量篇幅介绍他加入国民党后,在北方从事的活动,也是理所当然的。其二,由于当时敌人把李大钊等一案诬为“苏联阴谋案”,把共产党诬蔑为“赤俄的工具”,并借此大搞所谓“讨赤驱赤”。为了取信敌人对革命和对苏联的诬蔑,李大钊在二稿、三稿中指出:“中山先生之外交政策,向主联俄联德,因其对于中国已取消不平等条约也。”“以后中山先生返粤,即约聘俄顾问,赞助中山先生建立党军,改组党政。”他这样写,是为了说明国民党与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往来。

另外,他坚决声明:他们的住所是由国民党人徐谦等掌管的“庚子赔款委员会”,而不是苏联大使馆;一切事务“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之用款,向系由广州汇寄,近则由武汉汇寄。”

初稿只有前三部分,二、三稿增写了第四部分,也是最让人动容的部分,其中第三稿李大钊以气壮山河的气概写道:“我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三稿为何只字未提共产党

《狱中自述》三稿,李大钊都只字未提共产党,只谈国民党。这是为什么呢?由于李大钊当时不是一个人被捕,而是有几十位革命同志与他一同被捕。同时,革命领导机关被破获,许多文件落到敌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避免党组织被再次破坏。这就需要在恪守原则的前提下,采取机智的斗争策略。

张作霖极端仇视共产党,李大钊倘若在狱中亮出自己中共领导人的身份,其后果可想而知。孙中山曾与张作霖结成军事联盟,李大钊利用自己国民党员的身份,与敌人周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为了保护党组织和被捕同志,他在狱中绝口不谈共产党,只谈国民党。

李大钊在三稿自述中都大谈特谈国民党,但也并不是什么都说,他还是有所策略、有选择的。例如:为了迷惑敌人、保护革命,李大钊在自述中写了一些假情况。他说国民党“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只是设法收拢北方民众了解国民党的主义,增收党员而已。”又说“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因此并没有工会组织,传言党人在北京将有如何之计划,如何之举动,都是谣言。还有经过慎重的选择,李大钊在自述中谈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国民党的情况。如谈到了国民党一些头面人物——蒋介石、汪精卫、李石曾等,还谈了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情况。这些

情况全部是已经见诸报端的。他之所以这样写,完全是为了保护和他一起被捕的革命同志。

由于李大钊的三稿自述都没有一个字提到共产党,也根本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更谈不到有任何泄露党的机密之事。这一点,就连当时的敌人也不得不对外界承认:“李无确供”。

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

在狱中,李大钊对同时被捕的妻女及家事从未提及,却在《狱中自述》的最后向奉系当局提出:“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在他心里永远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他心中惦念的是革命同志,是为革命保存更多的力量。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在《回忆我父亲李大钊被捕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写道:“父亲在狱中‘绝口不提家事’,联想到父亲在法庭上见到我们时的那种冷漠而毫不留恋的态度,我相信这话是真的,尽管当时对父亲的这种冷淡我作梦也没想到,但在事后还是非常能够理解我所敬爱的父亲,他永远爱我们,可是在他坚强的内心,革命事业所占的位置,却要比妻子、儿女、个人的安危重一千倍!重一万倍!”

细读李大钊的三稿《狱中自述》,发现三稿都充分体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伟大情怀。他临危不惧,舍生忘死,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的革命精神,在三稿自述中都体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他向奉系当局提出宽大处理爱国青年一事,充分体现出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卓越领导人的崇高革命气节和无产阶级的宽广胸怀!每每读到此处,都让人为之动容!

1927年4月28日,张作霖不顾社会舆论的反对,以“实系赤党,宣传共产,意图扰乱公安,颠覆政府”的名义,下令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志士秘密押到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刑场施以绞刑。面对绞刑架,李大钊从容不迫、大义凛然,第一个走上绞刑台英勇就义。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

国家博物馆举办 考古成果展

本报记者 付裕

2022年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创建110周年,与此同时,国博考古已走过百余春秋。近日,“积厚流光——国家博物馆考古成果展”正式举行,展览全方位展示国博考古的发展历程,时间跨度大,展品数量丰富。据了解,在此次展览中,240余件考古出土的代表性文物,展示了百余年来国博考古不断开拓进取的历程和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呈现国博考古从陆、海、空不同维度立体式找寻中华灿烂历史文化的物质遗存,探索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的努力及成果。

据策展人陈克双介绍,此次展览信息量和知识量巨大。展览内容涉及国家博物馆百余年来主持或参与的约70个考古发掘和调查项目,从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到清代水下沉船发掘,从不同时期、不同角度,用考古学语言、考古学方法、考古成果和考古资料向观众呈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讲述悠久灿烂的中国故事,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反映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

此次展览分为初期革创、筚路蓝缕、与时俱进、时代新章四个部分。据了解,1921年,几乎与仰韶遗址发掘同时,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委派裴善元等人前往河北钜鹿(今河北省巨鹿县)发掘宋代古城,开我国历史考古风气之先。此后数年,又相继在河南信阳、湖北枝江开展古代墓葬发掘,前往京、冀、晋、蒙、豫、鲁、新等地开展文物调查等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博考古长足发展,始以田野考古为主,后陆续开拓水下、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领域,设立专门机构。先后主持山西垣曲古城东关、南关商城、河南渑池班村、江苏连云港孔望山、山西绛县周家庄、江苏泗洪县韩井、陕西宝鸡吴山、河北康保兴隆等遗址田野考古工作;组织

开展南海一号沉船遗址调查、平潭碗礁和大练岛一号沉船遗址等水下考古工作;开拓实施河南洛阳汉魏故城、内蒙古赤峰古城址等区域的航空考古调查工作。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组织实施三峡文物保护,努力从陆地、海洋和空间不同维度找寻中华灿烂历史的物质遗存,探索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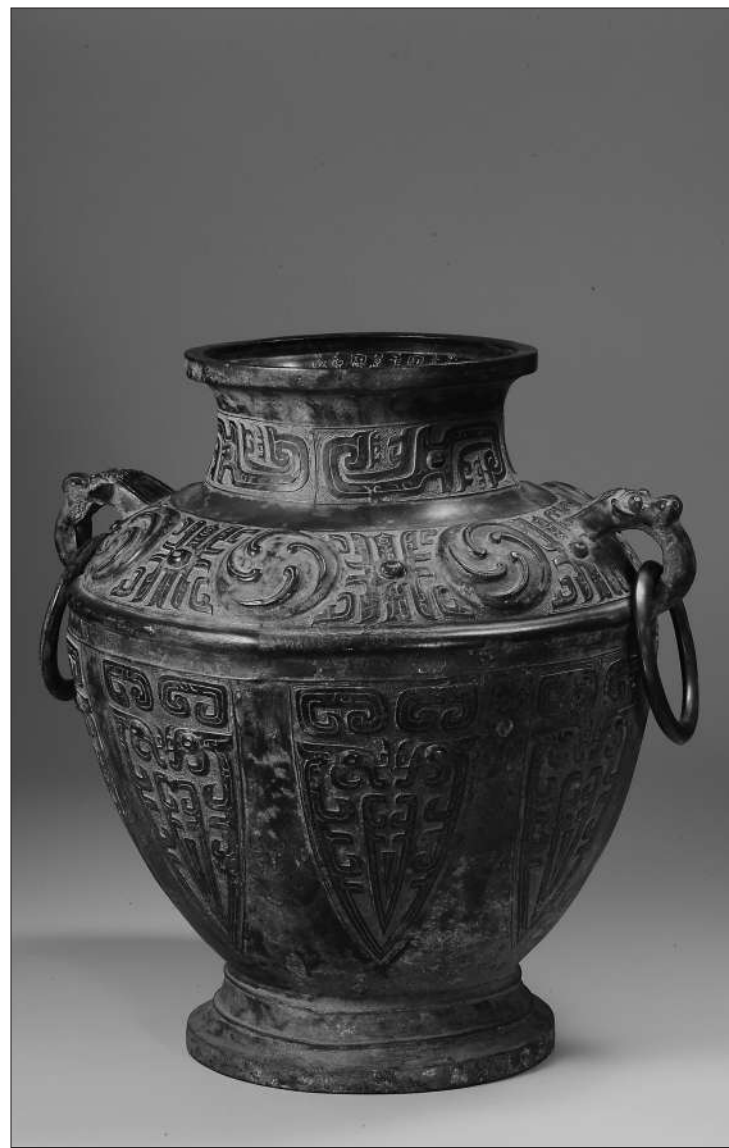
近年来,中国国家博物馆紧跟时代要求,重塑工作格局,优化组织机构,在原综合考古部基础上成立考古院,明确主要工作任务是服务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参与开展雄安新区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在巩固做好传统优势考古项目的基础上,逐渐向西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倾斜,重点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华文明起源等重大工程,探索反映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古代丝绸之路形成与变迁的代表性物证。

在展览中,展览文物精品纷呈,品类众多:江苏省泗洪县韩井遗址出土的距今8500—8000年的炭化稻;山西垣曲商城出土的研究商代前期礼仪制度的青铜鼎;甘肃甘谷县毛家坪遗址出土的目前考古仅见的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作器——子车戈;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遗址出土的东西方文化合璧例证——蓝釉杯;钜鹿宋城出土的宋代青白瓷瓜棱式执壶;“南海一号”“华光礁一号”“碗礁一号”等沉船出水的外销瓷器;迄今所见地球历史上最大的骆驼——金远洞巨骆驼的骨架等等。

据了解,此次展览旨在通过展示国家博物馆百余年在考古工作中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就,让国家博物馆发展积累的考古成果与人民大众共享,努力使考古学这一学科全面走向社会公众,使考古成果惠及民众,服务社会。



对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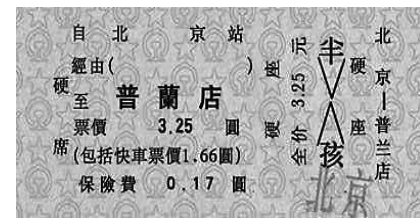


对壘 西周中期

对壘1973年3月出土于凤翔县田家庄公社劝家村。从族徽、日名的习俗来看,此壘的作器者应该属于商遗民。

铭文中提到“子子孙孙,其万年永宝用”,是典型的西周金文常见眼辞,希望后世子孙世代昌盛,发扬家族荣耀,将此器永远流传珍用。

1959年9月15日,是北京火车站售票员贾根柱最难忘的一天。这一天,他见到了毛泽东主席,还得到了北京站售出的第一张火车票,这张火车票揭开了人们对大连普兰店冰封的记忆……



主席向自己的窗口走过来,立即再次起立向毛泽东主席敬礼。毛泽东主席在贾根柱售票的玻璃窗前,示意他坐下,询问他的工作和售票准备情况,并要着一张火车票,贾根柱连忙抽出一张硬座火车票递给毛泽东主席,这是一张由北京开往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的129次列车加快票,票价3.25元。

毛泽东主席饶有兴趣地拿着这张火车票,正反面都看得很仔细,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新中国的火车票,倍感亲切。毛泽东主席说:“普兰店,这不是的故莲的故乡嘛?”贾根柱回答:“是,主席,这里还是打响辛亥革命东北第一枪的地方,是罗荣桓将军登陆北上指挥

一张火车票的故事

战秀玉 吕东浩

辽南解放战争的地方,被陈云同志誉为“屋檐下的革命根据地”。

第二天,《人民日报》报道了毛泽东主席视察北京站的消息,“一张火车票的故事”被载入北京站发展史册,也使“普兰店”的名字随之放大,吸引了更多人好奇的目光。

普兰店这座小城地域不大,却是大连城史纪元开端的“沧海郡”遗址,它将大连的历史上溯到公元前128年,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人口不多,却涌现出抗联游击队“特工人员”宋双雄、解放战争时期的“爆破英雄”宇克勇、抗美援朝时期的“血洒异国”英雄林作玉、“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英雄于庆阳等各时代的革命英雄人物。这里自然资源丰富,有“天赐泉浆”“亚洲第一”的安波温泉,有品质优良储量近120亿立方米的花岗岩矿藏,尤其是“千年莲子”的问世使普兰店又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莲城”。

悠悠岁月,莲城儿女坚韧不拔、勇于突破、自强不息,将“莲子精神”进

一步演化,成为这个城市的灵魂,在改革的大潮中指引着人们前行的脚步。普兰店作为大连的新城区,已经成为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重要节点,走在时代前沿。长皮、丹大高速公路及皮口港形成的海陆交通网络,将普兰店织进辽宁渤海湾经济圈,助推了服装服饰、食品加工、木制品加工、汽车零部件、电力设备器材、通用设备制造等六大支柱产业壮大发展。“中国互感器之都”“中国辽参产业之都”“中国西装名城”“中国橱柜名城”成为普兰店更加耀眼的“桂冠”……

毛泽东主席拿到的“北京——普兰店”火车票,是新中国第一代火车票。当年,有心的贾根柱自己掏钱将这张毛泽东主席看过的火车票买了下来,成为新中国北京站售出的第一张火车票,他终生保存,视为传家宝。这张火车票,也使普兰店有缘与毛泽东主席“牵手”,乘着改革开放的“和洋号”列车,奔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本文作者之一战秀玉系大连市普兰店区政协委员)